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伦理的运行机制理论 及其现实启示

刘少明

摘要: 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伦理作为有意识构建的意识形态, 具有规律性的运行机制。第一, 资本主义伦理的本质和形式的统一。资本主义伦理本质上为生产方式服务, 但是为生产方式服务的本质需要通过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生存伦理等形式表现出来。第二, 资本主义伦理在社会性和个人性上的统一。资本主义伦理是通过人的社会交往形成的, 但是最终落实在人的认知、情绪和欲望之上。第三, 资本主义伦理的时间性和稳定性的统一。资本主义在其变化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的利益而宣扬变化着的伦理, 但是变化着的伦理中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核心伦理规范。马克思对三重伦理运行机制的揭示, 为洞察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伦理的新变化提供了理论工具,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伦理启示。

关键词: 马克思; 伦理; 运行机制; 启示

中图分类号: A811.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4)06-0001-12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41125.001

马克思认为伦理或者道德^①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 它作为社会意识并不独立于物质生产。这从伦理的起源可以看出来: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 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 (P162)} 资本主义伦理, 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 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等进行理论辩护和教化的意识形态, 往往表现为经济运行的规则、政治法律建构的理念、人们行为的准则等一系列价值性导向的规范。但是, 当人一定程度上可以脱离“现实”去现实地构造伦理的时候, 伦理就有了自身的运作机制, 它可以适应生产方式去构建民族性的、社会阶段性的具体伦理。尽管, 资本主义伦理的构建受制于资本社会的限制, 它的表现形式仍然在生产方式的限制范围内。于是, 资本主义伦理就形成了实质和形式、社会性和个体性、时间线和稳定性相互作用的对立统一机制。学界已有对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研究, 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 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的意识形态本质, 认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考察道德, 就是要把道德纳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2] (P181)}。第二, 研究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内涵。研究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技术伦理、人本主义伦理、异化伦理等具体伦理思想, 阐述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丰富内容。第三, 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特征。比如认为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具有整体性, 具有“价值主题的一贯性、理论视角的融合性, 又表现为研究方法的综合性”^[3]。但是, 既有成果未专门研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伦理的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经验及其现实启示研究”(2023ZSS004)

作者简介: 刘少明,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liushaoming@fudan.edu.cn (上海 200433)

^① 伦理更加重视外在规范, 道德更加重视内在约束, 但是伦理也可内化为人的道德, 道德也可以表现为外在的规范, 因此这里对二者不做严格的区分, 在文章中伦理和道德作为同义词使用。

运行机制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伦理的运行机制进行了三个层面的探讨，为剖析当代资本主义伦理的新表现提供了理论工具，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伦理启示。

一、伦理的本质和形式的统一：为生产方式服务的本质与多维的表现形式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伦理的本质功能是为生产方式服务，它的多维表现最终要为这一目标而运转。但是，伦理可以体现为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生存伦理等多样维度，以一定的方式体现“独立”于生产方式的多样化特征，从而形成二者的辩证统一机制。

（一）伦理的多维表现服从于为生产方式服务的本质功能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从经济状况良好的生活角度来论述道德善”^{[4] (P289, 290)}，体现了伦理为生产方式服务的功能，这一功能是由伦理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决定的。马克思“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 (P171)}。他阐释了伦理的社会起源和本质的“元伦理学”，论证了伦理在社会结构中是生产方式的从属品。

第一，经济伦理直接为生产方式的运行服务。经济伦理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人的行为规则，它包含“尊重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和劳动者自由意志的原则”^{[5] (P8)}、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公平竞争等伦理原则。但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6] (P887)}。资本主义以原始积累和剥夺为其基础，承认这种原始积累并将其转化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伦理规则，实际上是将其剥夺道德化，将既得利益的资本家的生产合法化。同时，资本生产并未真正尊重劳动者的产品和生产意愿，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一方。而公平竞争，则是大资本家所期望看到的，因为“资本之间的竞争扩大各种资本的积累”^{[7] (P24)}，使得大资本家不断获得原料价格、销售价格、金融贷款方面的红利，最终获得垄断优势。因此，经济伦理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条件，为资本家的经济利益服务。

第二，资本逻辑的广泛影响，使得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生存伦理都间接地为经济生产的方式服务。政治伦理方面，资本主义重视自由选举、代议制原则，推崇政府的“合法”化。但是，政治伦理最终落入资本家对利益的算计之中，比如“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租金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1] (P708)}，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变成了资本家捞取利益的“合乎伦理”的场所。社会伦理方面，资本主义重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伦理，但资本逻辑使得“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 (P404)}，虽然“自由言论”形成的公共舆论符合社会交往的伦理，但它作为精神产品变成了经济运行的一环，成为经济获利的工具。最后，生存伦理也为生产方式服务。资本家为了积累资本而节约：“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节制，对生活乃至人的一切需要加以节制”^{[7] (P252)}。对于工人来说，他们必须消费，消费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但是“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8] (P694)}。这两种生存方式的伦理，最终成为资本逻辑运行的两个环节。

第三，伦理作为意识形态，其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也依赖于物质产品的生产。“‘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1] (P161)}当然马克思所指的语言是指直接表达为文字性的符号，但它还能以多样的方式存在，展现为更多的物质表达形式。伦理意识作为资本主义中人的意识，需要以物质性的方式延续和传

播，以确保影响力的持续存在。资本主义通过将人和物都化作商品，并且尊重财产的私有来表达；资本主义将选举程序和规则，将人的选举权等政治伦理印在册子上表达；资本主义鼓励资产阶级发声但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发声来宣传其社会伦理主张；资本主义通过鼓励消费新风尚来引导消费，宣传生活伦理。商品的生产和使用、宣传的册子、发声的渠道和方式，新风尚所消费的商品都是伦理的物质性“语言”，它的形式和内涵都展现了伦理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伦理语言的物质化意味着它们被商品化，最终反过来又依赖资本主义的生产。

（二）伦理为生产方式服务的本质需要伦理的多维表现来掩饰

资本主义生产的运行是以资本积累和对工人的价值剥削主导的，但是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生产伦理等在产生时也具有间接的非生产性质，并且力图规避自身的本质功能，从而展现自身的独立性质。因此，伦理为生产方式服务的功能需要伦理的多维表现来补充。

第一，资本主义将其生产运转的逻辑起点和逻辑过程建立在伦理之上，从而将经济的运作“奠基”在伦理法则上，以体现其合法性。以“平等”为例，作为经济运行的逻辑起点，从伦理上可以合理地推出价值的平等交换、劳动力与价值的平等交换、平等的分工等法则。因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1] (P230)}，整个社会运转就变戏法地建立在伦理法则及其逻辑推理之上。同样，在政治建构中，选举政治、政治身份和结构建立在平等的选举之上；在社会交往中，每个人平等地表达自身的观点；在生存伦理上，每个人可以平等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都符合平等的伦理追求，也是“善”的追求。

第二，资本主义用伦理的多维表现来掩饰经济生产造成的结果不平等。资本主义善于将伦理概念进一步“科学化”，掩饰伦理的非经济立场。以“价值”概念为例，价值作为人与人的交换关系，它指示的是产品的交换比例关系，是可以计算表达事实的科学关系。因此，以艾伦·伍德为代表的理论家甚至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存在伦理意蕴。但是，资本主义将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凝结，忽视了生产过程中对个体产生的不同结果，尤其是个体时间的紧张、发展的受限、身体的压迫等问题；资本主义也忽视了不同个体能力、运气带来的结果上的不均，阶级压迫的问题。因此，“价值”交换背后涉及生产伦理、分配伦理的问题。因此，资本主义企图用“科学”掩饰生产过程的伦理问题。同时，当资本主义存在明显的结果不公时，就会以“博爱”的伦理争取工人阶级，或者掩饰自己对工人的让步。首先，伦理可以争取无产阶级的帮助。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首先“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1] (P164)}。而夺取政权时，资产阶级必须拉拢其他阶级的人，使得其他阶级的人感受到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在为自己而战。比如在法国二月革命的时候，“法国社会中所有阶级，都突然被抛到政权的圈子里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座而登上革命舞台亲身去跟着一道表演”^{[1] (P452)}。这时候“博爱”就成为资产阶级的伦理幌子，使得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效劳。但是，这个谎言迟早会被戳穿，无产阶级意识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就会奋起反抗。资产阶级继而又会用“博爱”欺骗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给予无产阶级好处，“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1] (P235)}，证明他们并没有违背“博爱”的伦理。其次，伦理掩饰资产阶级的让步。在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博爱伦理往往是工人阶级通过斗争获得的。当工人通过与资本家斗争争取了十小时工作制以后，资本家宣称博爱是人道主义的关怀，但恰恰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9] (P8)}。

第三，经济生活被具体化为伦理的多维表现，以转移经济生产带来的直接矛盾。经济生活不是现实的人的全部生活，它需要具体化为政治生活、家庭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最终又转化为这些方面的伦理规定。伦理的多维度体系看似离经济生活较远，但对于转移经济生活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家庭关系中，资本主义“把妇女当做共同淫欲的俘虏物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

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7] (P76)}，将私有制的经济所有权的伦理态度转化为家庭伦理的对人的态度，仿佛人也是其“私有财产”。家庭伦理将经济追求变成表面的“非经济”要求，社会运转被理解为人與人交往的单纯的伦理规定，一定程度缓解了经济斗争带来的阶级矛盾。在生态伦理层面，生产上对自然的剥夺源于对自然的资源化而非环境化理解，经济问题最终转变为观念和伦理问题，消减了背后的经济运转带来的社会冲突。因此，伦理的经济实质和伦理的多维表现相结合，实现了资本伦理本质和形式的统一。

二、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伦理作为社会交往规范和作为个体本质显现的关系

伦理通常以社会交往规则的方式出现，并且以文字、习俗、技术、权力等形式存在，深刻影响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方式。但是，伦理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最终也体现了社会对人本质的认知、情感、欲望等方面的塑造。同时，“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人中能引申出人们的一切关系”^{[1] (P181)}，因此个人的本质也能反映社会交往结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伦理的运转，符合社会交往方式和个人本质的辩证统一，也实现了资本主义伦理的宏观和微观的统一。

（一）伦理的社会性体现为个体行动和交往的社会规范

伦理作为上层建筑，一开始只能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出现，因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 (P161)}。作为社会意识的伦理规范，力图维持固有的社会生产方式，“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 (P180)}。资本伦理对人的行为进行指导和强化，它展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交往和价值评价，使得伦理的社会规范成为个人内在的伦理观的塑造基础。

第一，社会交往为伦理规范提供了诞生和持存的条件，也成为个体行动的外在规范。首先，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思想等领域的独特交往方式，为资本伦理提供了诞生的基础。“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1] (P405)}，使得“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既成为法律概念，也是社会公认的伦理范畴。同时，贸易交往中为了“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 (P403)}，劳动力买卖中为了肯定“商品占有者和劳动商品占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6] (P881)}，资本家将自由和平等当做基本的经济伦理。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1] (P180)}的伦理。资产阶级消灭了封建社会中的贵族阶层，将所有的人当做“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以自由人的平等选举和民主的程序构造政治制度，为政治伦理的诞生提供了交往前提。在思想方面，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让构造伦理的思想家出现，“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1] (P179)}，他们根据有利地位宣传资本家统治的伦理，也为资本主义伦理提供了“标准答案”。其次，资本主义的独特交往方式，为资本主义伦理提供了持存的社会条件。“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1] (P407)}，工人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遵从出卖自身的自由交换、人力资源自由竞争的伦理。没有资本的工人只能生产工人，这种对经济分工及其伦理的服从将持续下去。同时，在政治竞争中由于资本占据主导，有钱的资本家在选举中胜出，工人听凭资本家的摆布，使得自由、平等的虚伪伦理所主导的政治制度得以长期存在。最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为国际伦理提供了运行条件。资本主义“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 (P404)}。因此，伦理既充当着国家交往的敲门砖，使得靠其他生产方式运行的国家服从资本主义伦理。同时，国际交往的伦理也是其剥削工具，资本主义将

自由交换、平等竞争的虚伪伦理推广到国际领域，但其本质是经济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殖民和渗透。而资本主义中的个体，往往也遵循着这些虚伪的伦理，堂而皇之地获取利益。

第二，社会性的伦理评价为伦理运行提供了外在引导和物质保障。伦理评价，可以表现为鼓励性的评价，也可以表现为强制性的评价，甚至是惩罚性的价值评价。资本主义对伦理的价值评价可以从舆论、权力、技术三个方面展开，使得伦理最终成为社会性的伦理。首先，资本主义以社会舆论引导资本伦理成为主流价值观。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做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6] (P869、870)} 在资本主义较为稳定的时期，资本家掌控着一系列的新闻报刊，使其伦理思想得以传播，反对声音被审查和禁止，比如马克思早期就因其言论而不断被资本主义国家驱逐。其次，资本家通过政治权力制定生产制度，对工人实行监视和管理以推行其伦理，“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1] (P407)} 这种伦理宣扬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如果工人不遵守将会受到惩罚。“‘兵营式的纪律’展示出工人在工厂中受到了严格的管控、规训”^[10]，这一管控和规训既是制度的，也是伦理的。同时，资本主义通过权力颁布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确保资本伦理的传播和运行。最后，资本主义还通过技术来确保伦理得以贯彻。资本主义生产电气化的照明工具和精密时钟，让工人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劳动。而且，精密时钟的出现加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时间控制，时间不再与劳动者的身体感受挂钩，它变成了抽象的时间。“抽象时间这一由社会机制所公开控制的时间形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其他方面一样，是‘客观的’。”^{[11] (P248)} 客观时间要求客观和平等的交换，因此“平等”交换的伦理得以贯彻。资本主义还生产耐用的机器来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使得资本主义伦理的底线不断被突破。在工厂手工业中工人尚未被大型机器所奴役，但是“进入大工业时代，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工具对人的身体支配和观念统治”^[12]。大机器生产中工人的身体、精神和时间都被资本的技术所宰制。“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6] (P270)} 舆论、权力和技术，构成了资本主义伦理评价的三个环节，推动着伦理的社会化，也使得个体在行动和交往时要从这三方面遵从社会的伦理规范。

（二）伦理的个体性体现为社会性规范对人的本质的塑造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伦理作为社会交往规范，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本质具有深刻的塑造作用，以至于“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 (P252)}，每种社会形态中人的本性是变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被伦理所塑造的人的本质可以表现为认知、欲求、情感三个方面，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性伦理对个人的“异化”。

第一，资本伦理深刻塑造了人的欲求。首先，资本伦理加速了资本家欲望的膨胀和工人欲求的缩小。资本社会肯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将平等的竞争作为基本的运转规则。在竞争如此激烈和没有安全感的社会背景下，人的欲望彻底被私有财产所占据，变成了多多益善的贪婪。“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之中”^{[7] (P121)}，他们对待工人、自身、自然的伦理就是商品交换和货币升值。工人的态度相反，自由出卖劳动是其唯一伦理，“工人只能拥有他想活下去所必需的那么一点，而且只是为了拥有这么一点，他才想活下去”^{[7] (P121)}，工人的欲望被缩小和限制。其次，资本主义伦理表现为资本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使得人的追求更加单一化。资本社会对资本形成了人对抽象物的崇拜伦理。资本拜物教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人与人失去了各种情感、社会地位等基础上的责任和尊严。“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 (P403)}，只追求金钱或货币的增加。甚至工人的欲求也被其消费宣传所感染，追求单一的货币存储。同时，资本社会崇尚商品拜物教，使得资本家追求的是商品生产的增加。工人陷于异化劳动之中，“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

段”^{[7] (P54)}, 将工人限制在肉体需要的生产的单一维度上, 失去了多维度和自由发展的可能。这样, 个体的欲望就成为被社会所限制、影响和塑造的欲望。

第二, 资本主义伦理塑造了人对伦理的认知。卢卡奇认为, 资本主义利用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原则, 逐步渗入到人的认识形式。“分工像在实行泰罗制时侵入‘心灵领域’一样, 这里侵入了‘伦理领域’”^{[13] (P169)}, 使得人的伦理观念陷入了直观之中, 难以突破资本主义社会构造的“客观化”伦理牢笼。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伦理的认知的起源和表现的阐释, 也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伦理认知的直观化。首先, 资本主义通过伦理学家的学说确定伦理的内涵, 使得资本主义伦理成为社会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 使得伦理认知有了外在依据, 这在分析伦理的社会交往基础时已经阐述。其次, 资本主义通过人的内在的学习、重复体验来加强伦理, 使得伦理认识得以确立。马克思认为, “对于无产者来说, 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 即劳动, 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已变成一种偶然的東西, 单个无产者是无法加以控制的”^{[1] (P200)}。工人只能在劳动中服从于物的力量, 他学习到的只能是人之间的竞争伦理。对无产者来说, “他从早年起就成了牺牲品”^{[1] (P201)}, 在行为上重复和感受阶级压迫的伦理。比如劳动者工作日不断延长, 压缩生命的道德界限和身体极限, 强化了资本家和工人对阶级区分、压迫的伦理认知, 并以此作为“习惯”。最后, 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将人物化, 使得人也被当做物对待。资本伦理被增殖的合理化所引导, 将人当做增殖的工具, 资本主义中伦理学家难以突破这一认识形式。比如“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 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 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1] (P145)}。但是他们的道德要求仍然停留在资本伦理的利己要求上, 最终囿于资本伦理的永恒化或目标化的认知。资本家也难以突破这一认识形式, 因为“作为资本家, 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6] (P269)}, 他的伦理认知完全被“灵魂”所绑架而变得扁平化, 所以才会有将人物化的伦理。这种绑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比如马克思谈到的“在美国南部各州, 当生产的目的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 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 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需要七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 就成为一种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制度的一个因素”^{[6] (P273)}。这体现了资本家在物化工人方面的认知的逐步深入, 而“盘算的制度”就是认知被塑造的表现。个体的认知被资本家所算计, 陷入了虚假的社会性认知和意识形态的认知之中。

第三, 资本主义的社会性伦理规范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的情感。欲望表达了人对外物的追求动机, 认知代表是对外物的认识形式, 情绪则表达的是人对外物的内在感受。马克思对伦理的认知建立在三者的统一基础之上, 认为伦理的欲望和认知影响了伦理的情感。首先, 资本伦理将人的伦理情感变成自私自利的情绪。人在“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 (P403)}。人因为其他人给自己带来利益而高兴, 因他人损害自己的利益而愤怒。伦理情感所指向唯一对象就是利益的得失, 失去了传统社会伦理情感指向的身份、责任等内涵, 也失去了荣誉、羞耻等内涵。其次, 人因为欲望的单一化和认知的直观化, 在伦理上失去了对他人的同情。比如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病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 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均化’”^{[1] (P158)}。费尔巴哈不从社会生产方式来解释工人的悲惨处境, 其认知被资本伦理直观化, 对工人失去健康的身体缺乏阶级同情, 也缺乏伦理上的同情。同样, 资本家对待工人如同对待物一样, 缺乏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伦理的同情。这一点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 比如1866年的伦敦的铁路员工, “10~12年以前, 他们每天只劳动8个小时。但是在最近5~6年内, 劳动时间延长到了14、18甚至20小时, 而在旅客特别拥挤的时候, 例如在旅行季节, 他们往往要连续劳动40~50小时”^{[6] (P293)}。

资本家对工人的同情心逐步减弱，最后只考虑赚钱的事情，体现了资本家的伦理情感逐步泯灭的过程。伦理上人与人的同情的缺乏，反过来也展现了人的欲望和认知的单一化，证明了伦理上的异化。人的同情心的缺乏是社会性的疾病，是社会失去人性的标志。

三、时间性与稳定性的统一：伦理的时间化演化与相对稳定结构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1] (P402)}，因此资本主义伦理在时间过程上包含一个发展和变革的过程。同时，在其变革过程中，资本主义伦理又必须维持固有的要素、功能、方向等方面的稳定性。资本主义伦理就因此形成了稳定性与时间性的辩证统一。

（一）资本主义伦理的时间性为其稳定性开辟道路

伦理的时间性是稳定性的展开，相对稳定的本质最终通过时间的变化体现出来，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讲，资本主义伦理具有内容上的时间连续性。资本主义伦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诞生、壮大和灭亡，不断受到其他社会阶段的影响，也会形成自己的历史生成性。在资本主义诞生初期，封建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还未完全消失，资本主义伦理仍然带有封建伦理的特征。“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种关系仍然带有宗法色彩”^{[1] (P190)}，因此资本主义推崇的自由、平等、竞争等伦理仍然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这时候人还未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架空，尚有一定的家庭、地域、身份等方面的交往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 (P405)}。资本主义伦理强烈排斥封建伦理，将人变成纯粹的工具，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建立在纯粹的经济竞争和阶级压迫之上，实现了资本伦理的绝对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资本主义伦理逐渐演化出未来社会的特征。工人打破了曾经被资本伦理绑架的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了新的交往和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1] (P409)}工人要求每个人自由的发展、分配的绝对公平、消灭阶级统治，与资本主义伦理要求的自私自利形成对抗。工人的斗争改变了资本家对待工人的单一伦理方式，迫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部分质变，展现了资本主义伦理逐渐吸收工人阶级代表的社会主义伦理的特征。当然，马克思认为伦理的改变只能通过经济方式的改变来完成，而且未来社会的“伦理”或者“道德”将不会是意识形态，而是一种自由人交往的新型伦理。因此，资本主义伦理受到不同社会阶段的影响，在历史过程上体现了时间上的连续性。

第二，资产阶级根据自身实力的变化，不断修正自己的伦理观念。资本主义使得“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1] (P403)}，资本主义会主动建构适应适合自身实力的规则，使其包含时间性特征。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较低阶段，为了迅速积累资本和获取社会统治地位，“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6] (P861)}。资本主义此时的伦理原则就是实力决定地位，暴力开辟道路，不断冲击封建社会的交往原则。在此过程中，资本家巧取豪夺，以其“伦理原则”获得了巨大的成果。随着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资本家为了维持国内社会稳定、推动资本逻辑的运行、压制工人阶级，又开始推行一种“文明”的平等规则，实际上行使的是对剩余价值的隐秘剥夺。所以，这种“文明”中包含着极度的野蛮，工人感受到的是剥削和压抑。当无产阶级威胁到自身统治时，资产阶级不会为了国内社会稳定而维持“文明”的规则，而是会联手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对本国的无产

阶级进行绞杀。比如在巴黎公社时期，“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显示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可是它们却大骂国家工人协会，把这个与之对立的、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家劳动组织说成是所有这一切灾难的总根源”^{[9] (P125)}。这种联合说明资产阶级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是总体上利益具有一致性，他们在利益受到威胁时，会把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展示出来，体现了国际伦理。资本主义在其初期、盛期和受挑战时期，根据自己力量的变化展现出不同的伦理精神，体现了其时间性。

第三，从文化特征上讲，资本主义伦理在变化中仍然保持着文化的特殊性，从而显现其时间性和历史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 (P403)}。资本逻辑下文化的伦理因素被金钱斩断的时间进度、斩断的程度等各不相同。首先，金钱关系对文化中的伦理因素的斩断进程不一样。“在英格兰，有的农村直到目前为止，一个工人还常常因为在安息日在自己房前的园圃里干点活，亵渎了安息日而受到监禁的处罚。”^{[6] (P306)} 英格兰的农村工人继承了传统的宗教伦理文化，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保留这种伦理上的赏罚措施。但是，在城市地区这种宗教伦理就消失得快一些，资本主义“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6] (P306)}，因此城市和农村的文化伦理因素的变化进度不同。其次，金钱关系对文化中伦理因素斩断程度不一样。比如在统一之前的德国，由于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当诸侯同君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1] (P14)}。因此德国资产者的伦理表现为“道德和忠诚——不仅是个别人的而且也是各个阶级的道德和忠诚——的基础，反而是有节制的利己主义”^{[1] (P13、14)}。德国资产阶级伦理体现了文化中继承的道德和忠诚，马克思认为它缺乏“解放”德国的精神生活能力，缺乏英法资产阶级那种进取的精神。但是，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要消灭各国文化中的伦理要素，使其被资本逻辑架空为金钱关系。这个过程体现为时间上的进度和消灭的程度的不一致，也体现了最终实现目标的时间进程不一致。伦理的稳定性总是通过时间性的方式表达出来。资本主义通过与其他社会形态的伦理的联系的时间性，根据实力调整的宣传伦理内容的时间性，文化和地域上变化不一致的时间性，使得资本主义伦理的稳固性展现出多样的特质，也使得资本主义的伦理具有了更强的欺骗性。

（二）资本主义伦理的稳定性为时间性变化提供界限

资本主义的时间性变动，最终要服从于其稳定性的结构，保障其在资本主义伦理的范畴内运动。具体来说，资本主义伦理的要素联系、功能作用、发展方向的稳定界限为其提供了稳定性，也体现了伦理的时间性背后的相对稳定的起作用的机制、运行的目的和变化的度，使得资本主义伦理在经济的基础上长久运行下去。

第一，资本主义伦理将人和自然当做价值实现的工具，体现了资本伦理的稳定结构。无论资本主义在其初始阶段，还是其鼎盛阶段，都将其冷漠伦理贯穿始终，展现了将人价值化的伦理态度。首先，将人当做价值工具对待，展现了其伦理要素的稳定联系。在资本伦理的个人化和时间性的阐述中，展现了资本主义伦理影响人的欲望、认知和情感，这些都体现了资本主义伦理宣扬的人对人的价值化态度。然而，资本主义伦理不仅包括对待劳动者本人的态度，资本家也算计着劳动者的下一代。“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6] (P199、200)} 对人的价值化态度从横向的剥削扩展到纵向的算计，资本主义伦理在静态和动态两种人际关系中被不断固化。其次，人对自然的价值化态度，巩固了伦理要素的稳定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的生存的手段”^{[7] (P54)}，人将自然看做潜在的价值物和现成的价值物，人可以利用自然的价值。人对自然的无限度的利用就成为资本主义生态伦理的稳定结构。而且，资本主义的生态伦理，也成

为资本增殖的基本手段，为人对人的伦理态度的继续提供了基础。因此，对人和对自然的价值化态度是资本主义伦理的双重稳定结构。

第二，资本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和工人的被压迫提供论证，展现了作用的稳定性。资本主义伦理力图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意识上的论证。首先，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永恒化的论证。资本伦理作为“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性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粹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1] (P228)}。资本主义伦理作为社会的目标和追求的理想，在许多人看来已经实现。伦理学家甚至将伦理神秘化，认为伦理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1] (P230)}，任何人的活动都要服从这种永恒的天命。永恒的论证为资本主义伦理去除了历史性和真实性辩护的风险，起到了麻痹工人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效果。其次，为工人对资产阶级的统治逆来顺受进行论证。资产阶级宣扬其投降主义价值观念，“如果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中只能争得一些让步，那就是在实行妥协”^{[9] (P278)}，因此工人还不如不斗争和不要进行无谓的反抗。工人面对剥削，只需要信仰宗教式的殉道精神，只需要“基督教殉道者应有的禁欲主义精神来忍受落在工厂工人肩上的14小时或16小时的劳动”^{[9] (P284)}。宗教的殉道的精神鼓励牺牲和忍受，它麻醉工人，使得工人从意识上依附于资产阶级统治。资本主义伦理的时间性流动，在其稳定的社会功能中找到了界限。

第三，资本主义伦理在政治上的目的是切断工人之间的联系，阻止工人组织的发展，实现资产阶级的永久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1] (P407)}，但其结果就是工人被机器和分工切割成生产过程的诸多环节，工人在劳动上和意识上失去了独立性。但是，工人阶级还是会联合起来反抗这种处境，形成工人团体或政党。然而，资本伦理试图教导工人，“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从事某种政治活动，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9] (P278)}，这会导致工人阶级的理论内部的自我冲突。资产阶级还试图教导流氓无产阶级和工人贵族，分化无产阶级的组织，切断工人的紧密联系。资产阶级通过伦理教育工人阶级认识到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与阶级之间的和平，他们不允许无产阶级认识到阶级的对立，认识到无产阶级内部蕴含的强大力量。“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1] (P417)}，工人将失去资产阶级想要的“文明”。资产阶级希望工人在政治生活中遵循资本主义的政治原则，从伦理上指望资产阶级发善心和给福利，消除组织上斗争的方式和勇气。政治上的目的和经济上的实质功能相辅相成，为社会伦理的时间流动性找到了稳定的目标。伦理的时间连续性的变化，仍然服从于资本主义对人和自然进行剥削的稳定性，也不会突破论证自身制度的“合法性”的稳定范围，并且时刻提防和破坏工人组织。稳定性使得资本主义伦理具有社会形态的特质，也说明了它难以超越自身的特质。

四、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伦理的运行机制理论对现实的启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伦理运作机制的探讨，为揭露当代资本主义伦理的新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伦理上的启示。

（一）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伦理的新特征提供理论工具

当代资本主义对伦理影响较大的变化，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更深刻地融合，技术的作用深刻，新发展模式和新社会结构的出现，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资本主义伦理对经济的服务性功能更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伦理的本质功能是为经济服务，但它也通过多重形式来进行功能的具体化和对功能进行掩饰。但是，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强化为经济服务的功能，使得政治伦理、文化伦理等更加经济化。经济上，表面上当代资本主

义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对工人的剥削却不断加强：“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14] (P2)}。政治上，金融资本主义更强地渗透进政治选举、政策制定等环节，使得资本主义的政治更多为资本家的利益和盈利服务。文化上，当代资本主义形成了文化产业或大众文化，“每个人都已经变成了一个要素，这种要素可能是某种实践的主体或客体，也可能是不值得一提的东西”^{[15] (P266、267)}。文化上追求的传承、多元发展的伦理都被当作资本盈利的要素。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伦理为经济服务的功能加强，也削弱了资本主义伦理的多维形式的掩饰功能，导致资本主义伦理更加单一化。

第二，资本主义伦理的强制性特征更突出，使得伦理的个人化与社会化更加统一。资本主义的强制手段包括技术、舆论、权力等多种方式，而技术手段对伦理的影响越发深刻。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强制手段深刻地引导伦理规则。“电视荧屏和政治封面向我们宣布生物医学的功绩：神奇的器官移植，新分子的发现以及借助电子技术完成的首次远程外科手术”^{[16] (P91)}，伦理规范也由技术的发展方向给出。在数字时代，“当传媒掌握了我的地址、婚姻状况、年龄、收入、驾驶的汽车品牌、购物习惯、饮酒嗜好和纳税状况时，它也就掌握了‘我’——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单位”^{[17] (P159)}，人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社交习惯都被纳入了简单的数字化统计和引导之中。伦理道德也由数字技术所宣传的年龄段、身份、爱好、婚姻状况的人“应该”做什么所规定，从而技术、权力、舆论更强地融合在一起，影响了生活和生存伦理。个人的认知、欲望和情感在当代更深刻地陷入资本家规定好的轨道上，甚至人的身体都被同一化的社会伦理所塑造。

第三，资本主义伦理的时间性演化使其伦理的内在冲突更剧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力图维护人与物的价值化结构，维护制度的永恒性和稳定性，实现对工人组织切断的目标。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模式带来了伦理的演化，使得资本主义伦理出现内在矛盾。首先，当代资本主义学习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利用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的方式减少了资本主义的冲突，实现一定程度的“平等”。但是“福利国家机构强加于资本之上的管理和税收负担等于是抑制了资本投资的动力”^{[18] (P3)}，导致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平等之间的冲突。其次，对自然的保护与对自然榨取的资本逻辑的观点的冲突。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绿色目标、绿色经济思想，以及旨在实现绿色目标的政治、制度以及策略手段”^{[19] (P455)}的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流行。这一思潮最终与资本家对自然的无限榨取和资源化掠夺冲突，导致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与人的生存理念的矛盾。最后，新的社会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对工人组织切断的要求相冲突。资本主义力图削减工人的组织，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阶层的变革，和平主义、女性主义、身份政治等社会运动也逐渐出现，与资本主义所推行的消费主义抗衡。资本主义的生存伦理、政治伦理甚至是经济伦理都面临内部的争端。和平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对其他国家的掠夺和剥削，使得资本主义的公平竞争伦理受到挑战；而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相对于男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 (P422)}，要求废除资本主义假定的自由和平等；身份政治则宣扬“个人、移民和难民、妇女、男女同性恋、语言、民族、文化、地区以及宗教少数派、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国家、原住民”^{[19] (P441)}等不同身份的人对西方文化的霸权反抗，反对其内部的不公。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迁，工人的联系以新的方式被组织，与资本主义伦理的稳定性相冲突，这些伦理也反映了资本主义伦理的部分质变。

（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伦理上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阶级的价值立场不同，追求的社会目标不同，传承的文化观念不同，因此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在伦理层面发展出独有的社会规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伦理运行机制的剖析，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伦理方面的启示。

第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构建过程中，既要强调伦理为社会经济服务的功能，也应重视构建

多元化的伦理形式，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伦理为经济发展服务。在经济建设中，遵循“效率优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的伦理原则。坚持多劳多得的制度，鼓励勤劳致富，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制度，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 (P28)}。将经济发展作为社会的伦理原则，坚持深化改革和发扬斗争精神的锐气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也用伦理观念指导社会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构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体系。在人与自然方面，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打破了资本逻辑将自然当做纯粹资源的伦理。在人与人关系方面，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20] (P23)}。在人与自身方面，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伦理，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也破除了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伦理陷阱。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要保持统一的价值规范，也要重视伦理的个人化涵养，实现社会与个人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化的伦理构建和伦理宣传。在伦理内容的构建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伦理内涵激励人，构建立体的伦理规范。伦理宣传上，以新的技术手段提升伦理的影响力，在媒体传播和网络治理上弘扬社会伦理。并且，努力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在伦理舆论阵地上占据高地。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伦理融合进个人生活。“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20] (P44)}在具体生活中，挖掘真实的伦理故事，以可信、可爱、可敬的伦理形象，以国家功勋荣誉的表彰激励，推动社会做到见贤思齐。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提高社会生活方式对人的感染力，加强道德的制度化建设，推动伦理观念认知的进步。中国式现代化对伦理的社会内容的重塑，对理想德行的人的追求，改变了人的情感和欲望对伦理的把握，超越了单纯的资本主义利益化伦理。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在伦理建设方面的历史性推进，需要借鉴传统文化和未来社会的理念，维持社会主义伦理的稳定性与时间性的统一。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伦理的时间性。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吸收中华传统优秀美德。“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20] (P18)}等价值观念，是传统文化中伦理观的重要体现。它让中国式现代化有了群众基础，让当代道德文明建设有了历史传承的“根脉”。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用共产主义的伦理观念来指引伦理建设。共产主义的伦理观念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追求，它要求人的自由、平等、解放。中国式现代化以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伦理目标，体现了共产主义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伦理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富裕作为建设的目标，体现了共产主义对人的平等的伦理追求，也让当代伦理建设有了“魂脉”。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稳定规范，在伦理的时间性变化中保持不变的伦理内核。“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引导全体人民自觉践行。”^{[21] (P313)}社会主义伦理的稳定性，将过去和未来两种伦理追求融于当下，为“根脉”和“魂脉”在伦理上的统一提供了合理方式，也为现代化的建设提供了明确的价值规范，为人民提供了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 宋希仁. 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3] 李培超. 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整体性[J]. 哲学研究, 2012(5).

- [4] [美]布尔克.西方伦理学史[M].黄慰愿,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 [5] 胡贤鑫.《资本论》伦理思想发微[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 [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0] 谭勇.关于马克思文化理论的三个追问及其解答[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
- [11] [加]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M].康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12] 徐昕.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批判[M].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
- [1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4]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15]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 [16] [法]米歇尔·布艾希.科技智人:从今天到未来的哲学[M].刘成富,陈茗钰,张书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17] [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 [18] [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郭中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 [19] [美]特伦斯·鲍尔,[英]理查德·贝拉米.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M].任军锋,徐卫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2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Operating Mechanism of Marx's Capitalist Ethics and Its Practical Inspiration

LIU Shao-ming

Abstract: Marx believed that capitalist ethics, as consciously constructed ideologies, have a regular operating mechanism. First, the unity of capitalist ethics in essence and form. Capitalist ethics essentially serve the mode of production, but the essence of serving the mode of production needs to be expressed through forms such as economic ethics, political ethics, social ethics, and survival ethics. Second, the unity of capitalist ethics in terms of sociality and individualism. Capitalist ethics are formed through human social interaction, but ultimately implemented by human cognition, emotions, and desires. Third, the unity of timeliness and stability in capitalist ethics. Capitalism promotes changing ethic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its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different interests, but maintains relatively stable ethical core norms within the changing ethics. Marx's revelation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triple ethics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criticizing the new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ethics, and eth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arx; ethics; operating mechanism; inspiration

(责任编辑 孙洁)